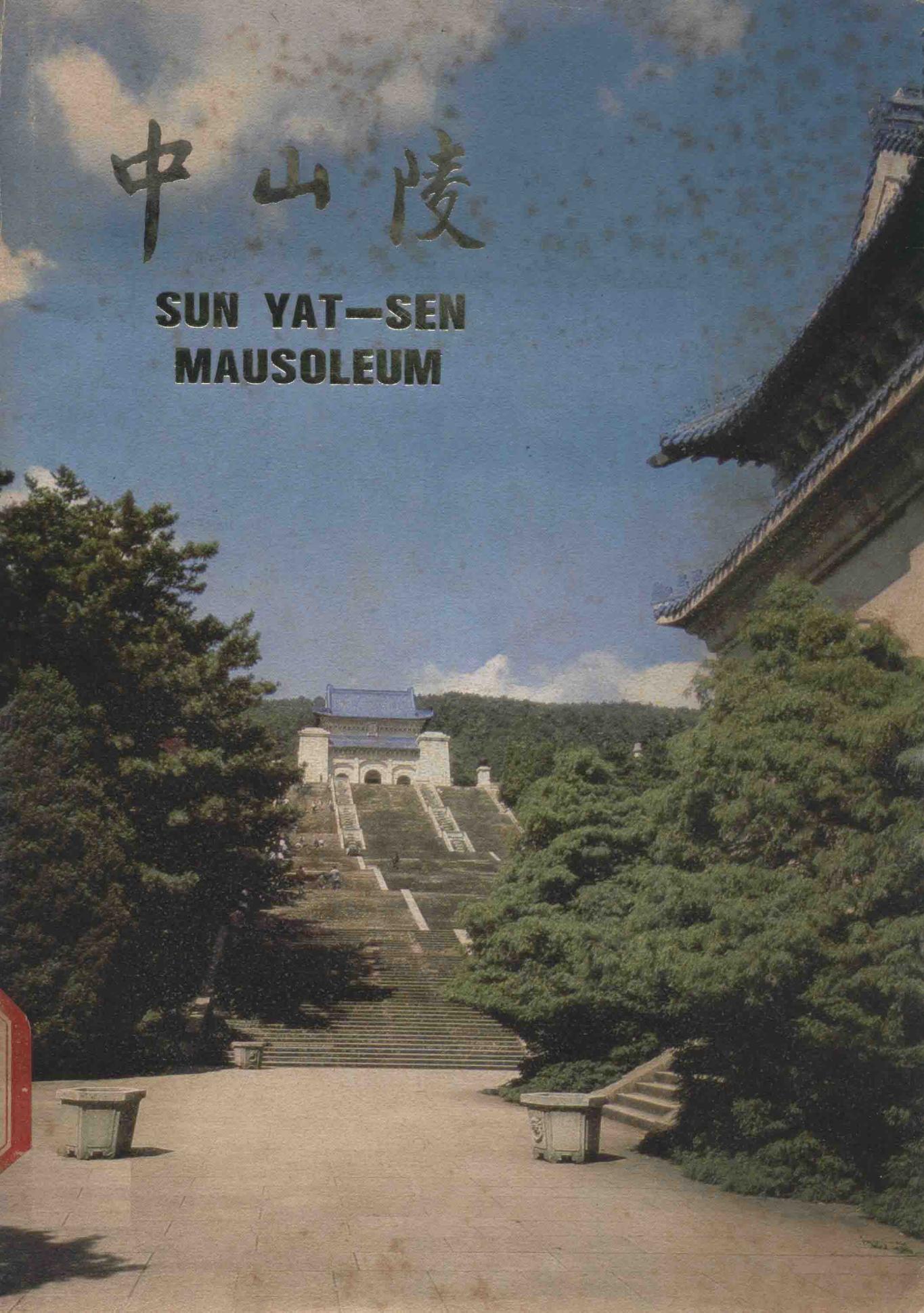


中山陵

SUN YAT-SEN
MAUSOLEUM



中山陵

姚 迁 古 兵 编 撰
郭 群 摄 影

文 物 出 版 社
北 京

装帧设计：彭华士 仇德虎

责任编辑：沈百昌

中山陵

*

姚迁 古兵 编著

郭群 摄影

文物出版社 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 发行

198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7.5

统一书号：7068·947 定价12元

封面题签：廖梦醒

蜀山中



蜀山中

中山陵

古 兵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中山陵，座落在南京东郊风景秀丽的紫金山南麓。

1924年（民国十三年）冬，孙中山先生为着推进国民革命，应邀北上商讨国是，在抵达天津后，肝病突发，翌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遵照孙中山先生归葬南京的遗愿^①，选定紫金山东部的中茅峰南坡为建陵地点。

陵墓自1926年（民国十五年）1月兴工建造。在这一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奠基典礼。至1929年（民国十八年）初，陵墓的主体工程次第落成。6月1日，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京西郊碧云寺迎回南京安葬^②。在陵墓周围后来又继续建造了一系列纪念性建筑。直至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各项建筑先后竣工，陵墓的建筑工程至此基本告成。陵园总面积约二千余亩^③。

中山陵平面构图呈警钟形，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醒民众，反抗压迫，为拯救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崇高思想和光辉业绩，寓意至为深切。

陵墓的建制，最前部为墓道，长323米，宽70米，分辟为三道。中道为水泥路面，左右二道敷沥青，中道与左右二道之间为花池，种植桧柏、雪松。墓道的东西两侧，又种植银杏、红枫。如今，宽阔的墓道两旁，银杏参天，桧柏葱笼，异常壮观。

墓道南端入口处，建有一座面阔三间的石牌坊，牌坊用福建花岗石建造，蓝色琉璃瓦盖顶，中门横楣之上，镶有一方镌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二字的石额。墓道正南，隔广场有一座八角形的三层石台，台上原放置紫铜宝鼎一尊，现矗立着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铜像。铜像原建于市中心新街口的街心广场，1966年冬迁至此处。

墓道北端连接陵门前广场，广场中央陈放着由墓道之南移来的宝鼎，鼎高大宏伟，上部鼎舍内竖立有六角形的铜牌一方，其上刻铸《孝经》全文。鼎体表面铸出“智、仁、勇”三字，字体为楷书，以赞扬孙中山先生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智。

越广场拾级而上即是陵门。陵门为一座歇山式花岗石建筑，面阔五间，三拱门，正面三门均安装梅花空格紫铜双扉，北面三门则仅有门洞而不安门扉。正面中门上方镶有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石额，顶盖蓝色琉璃瓦。

进入陵门，迎面就是碑亭。亭作方形，也用花岗石建造，重檐歇山顶。碑亭的东、南、西三面，各有拱门一洞，以供出入。北面也有一拱门，但下部装以石栏干。亭内正中矗立着高9米的巨形花岗石大碑一通，上镌“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三个金色大字，下款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楷书颜体，笔划遒劲，结体谨严，雄健有力。

自陵门通达祭堂，均为石阶，石阶全用苏州花岗石铺筑，共分十段，凡三百三十九级。各段石阶之间设有平台，以作缓冲，平台上有建筑物或陈列纪念物。自下而上第一层平台建陵门，第二层平台建碑亭，第六层平台陈列一对巨大的仿古铜鼎，第七层平台布置了一对人造石仿铜狮子。最上部三段石阶的两侧加修了石栏干，又在石阶上纵向设两行石围栏，将石阶分隔为三道。每行石围栏内放置特制的人造石大花盆共三十个，以备陈放盆景或其它纪念品之用。整个石阶两旁又依山势筑成坡面，铺以草皮，再种植海桐、红枫、石楠、桧柏、黑松等树木，布局和谐而庄严。石阶尽头是陵墓最高处的大平台，也即祭堂、墓室之所在。登上陵墓之巅，群峰皆居脚下，举目远眺，陵园景色尽收眼底，峰峦叠翠，松林苍苍，气象万千。

大平台东西宽162米，南北深38米，中部偏后与石阶相对是祭堂和墓室；前部边沿设石栏干作防护，又于石阶处东西对称建高约3.3米的台座一对，台上放置形体硕大的仿古带盖铜鼎；北部及左右两侧边沿均为花岗石拥壁，拥壁下遍植龙柏。平台东西两翼矗立着高大的望柱一对，柱用福建花岗石雕琢，高约12.6米，望柱断面作六角形，柱表六面均饰浮雕卷云纹。此外，平台东西两翼还各布置了草地四方，在这八方草地上，靠北的四方各种雪松一株，靠南的四方则列植盘槐七株。这些布置使祭堂周围的环境，更具庄严肃穆的气氛。

祭堂用香港花岗石建造，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上盖蓝色琉璃瓦，正面有三拱门，三门均装置梅花空格紫铜双扉，门框上方大额枋上，自东至西分别雕刻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名称：“民族”、“民权”、“民生”，书体作篆文。中门上下檐之间还镶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天地正气”直额一方。祭堂内部有青岛黑色大理石圆柱十二根，四隐八显。四壁下部以黑色大理石作护壁，上部则用米色人造石粉饰，东、西两壁的大理石护壁上，镌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全文，上方各有四扇窗牖，安装了梅花空格紫铜窗。北壁中央有墓门，可由此进入墓室。祭堂为盝顶。圆柱柱头、柱头枋、平枋、藻井等，均用镶花砌瓷装饰了色彩浓重鲜丽、图案新颖的彩画，朴实而富丽。地面用白色大理石铺砌。祭堂中央供奉着孙中山先生的坐像，坐像用意大利白石雕琢，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波兰雕刻家保罗阿林斯基所制作。基座的四侧，还镌刻了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为内容的浮雕六幅：正面一幅为“如抱赤子”，内容是孙中山先生正在为一个幼儿治病；东面两幅，其一为“出国宣

传”，画面是孙中山先生立志传播革命，在出国时和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位好友告别的场景；另一幅为“商讨革命”，画面是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一同商讨同盟会的纲领；背面一幅，为“国会授印”，表现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议会向孙中山先生授大总统印；西面两幅，一幅为“振聋发聩”，孙中山先生为了唤起民众致力革命，正在向劳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另一幅是“讨袁护国”，内容是孙中山先生在发表演说，号召讨伐倒行逆施的大野心家袁世凯。祭堂的四隅，还各建了一所城堡式的方屋，以作收藏纪念品和祭陵、谒陵人员休息之用。在外观上，方屋与祭堂结为一体，方屋挺立于祭堂的四隅，犹如四个威武的勇士，卫护着祭堂，使祭堂益加庄重威仪。

墓室位于祭堂之后，为一圆顶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外部用香港花岗石铺面。墓门在祭堂北壁，用黑色大理石做出影作门楼，门框横楣上镌刻孙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四字。墓门凡二重，均铜制，内门上铸有“孙中山先生之墓”七个阳文篆书大字。墓室内部以白色大理石铺地，妃色人造石粉饰四壁。穹窿顶正中用瓷砌的中国国民党党徽作为藻井。墓室中央为一大理石圆圹，石圹深入地下1.6米，圹口用大理石栏干围护，圹内置大理石石棺一具，棺盖上仰卧着由日本艺术家雕刻的孙中山先生的全身石像。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就安葬在圆圹之下。

在陵墓的主体建筑以外，还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是由当时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为缅怀孙中山先生而捐资修建的。这些建筑是：音乐台、行健亭、革命历史图书馆、光华亭、仰止亭、流徽榭和藏经楼等。

音乐台位于陵墓的左前方，是旅居美国三藩市的侨胞和中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合资捐建的。平面作半圆形，中心为舞台，也作半月形，高出地面约3米，台后部修一堵大壁，以汇集音响，紧靠台前有弯月形的荷花池，池底有伏泉，池水终年不涸。观众席为斜坡状的草坪，成扇面形，可容纳观众三千人。观众席外缘环以花棚架，架上紫藤茂密，生机勃勃，极为雅致。

行健亭建于陵墓西侧通向明孝陵的路口，是广州市捐建的。亭作方形，重檐，四角攒尖顶，红柱蓝瓦，彩梁画枋，修饰得鲜丽夺目。

革命历史图书馆座落在陵墓西侧的行健亭与陵墓之间，为一栋“T”字形的建筑。前为二层楼，作阅览室之用，后为三层楼，作书库。

光华亭位于音乐台东的山岗上，是孙中山先生奉安时，用海外侨胞的赙仪建造的。亭作八角形，全用福建花岗石建造，所有屋脊、屋面、檐椽、斗拱、梁柱、雀替、藻井等全由石材精工雕琢，花纹至细，刻工精湛，是陵园纪念建筑中最精美的一座。

仰止亭位于光华亭东之梅岭上，叶恭绰先生所捐建。亭作方形，四角攒尖顶，红柱蓝瓦，藻井、额枋、雀替等都描绘着色彩鲜丽的彩画，亭南面的额枋上题有“仰止亭”三字。

流徽榭座落在陵墓左前方的人工湖上，通称之为“水榭”，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捐建，为一座长方形卷棚顶的亭式建筑，湖面约二十四亩，环湖种植垂柳、碧桃、石榴等，景色秀丽。

藏经楼建于陵墓东侧深谷丛林中，专门用以收藏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是中国佛教协会发起募建的。这里环境幽静，远离喧嚣，正是研读孙中山先生革命学说的好处所。藏经楼为一座宫殿式的楼宇，外观像一座寺院。楼凡三层，底层为讲室，并有夹楼听座，二楼为藏经、阅经及研究室，三楼为藏经室。楼后原有迴廊式建筑，壁面镶砌着刻有三民主义学说全文的石碑，可惜房舍已在战火中毁坏，现在只残存部分石碑。

除上述纪念建筑外，原来还有一处桂林石屋，是广州市政府捐建的。石屋建于藏经楼以东的一个高阜上，为一座用青龙山条石和石板砌筑的二层楼建筑。屋面覆盖红瓦，屋前砌石阶通至大路，石阶凡一百七十级。石屋四周遍种桂花，故名“桂林石屋”。抗日战争中石屋被毁，现在仅存房基遗迹。

此外，为便于家属守灵，曾在陵墓后的山上修建了一栋家属住房，题名“永慕庐”，这所房舍也在抗日战争中被毁坏。

中山陵已成为我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纪念地，受到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衷心敬仰。新中国建立以后，整个陵园得到国家的妥善管理和保护。1956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中山陵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中山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十多年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前来瞻仰游览，缅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原名孙文，号日新，幼名德明，字帝象，又字载之；在香港学医时曾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后来遂称中山。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先生诞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学过裁缝，当过鞋匠，后来回故里务农，兼做村中的更夫。母亲杨氏操持家务。

孙中山先生出生的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时代。在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划分势力范围的剧烈竞争，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危机。清朝统治者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暴镇压，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家孱弱不振，政治黑暗腐败、官吏贪婪无能，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孙中山先生，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热忱地向往太平天国革命，真诚地崇拜洪秀全的事业和为人，以洪秀全第二自命^④。及年事稍长，随母亲去檀香山，进当地教会学校就读，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物质文明又使他得到新的启发，萌生了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念头。1883年冬，十七岁的孙中山先生由海外

返回家乡，眼见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官吏的贪污横暴，十分愤懑。他还在村里见到不少膜拜佛像的迷信活动，更觉十分痛心，深深感到不破除这些陈规陋习和种种愚昧落后的现象，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是不可能的，于是愤然捣毁了村里北帝庙的佛像。他的行动不但遭到人们的反对和指责，甚至被看作洪水猛兽一样可怕，有人竟要驱逐他。他在家乡耽不下去，不得不被迫离开家乡到了香港。

后来孙中山先生在《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中，谈到他当时的思想说：“忆吾幼时，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然而，促使孙中山先生真正立志革命的，是1885年中法战事的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竟然在取得一定胜利的形势下接受了屈辱的条件而讲和。战争以清政府

的屈服而结束，这使孙中山先生非常气愤，决心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此后，孙中山先生“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⑤，一方面在医校习医，另一方面从事革命思想的宣传和鼓动。当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论，被人们视作大逆不道。因此，他和在他的影响下共同鼓吹革命的三位志士，竟被称为“四大寇”，遭到习惯势力和不少人的攻击。可见孙中山先生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艰难。

1892年7月，二十六岁的孙中山先生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同时宣传革命思想。由于他的医术高明，业务十分繁忙，很快就成了有名望的医生。可是，孙中山先生此时所日夜思考的是挽救危亡中的祖国，因此，不久毅然放弃了医生的职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孙中山先生在早期还受着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894年他给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就是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政治主张，劝说清朝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认为“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⑥，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安乐的目的。孙中山先生的意见遭到李鸿章的拒绝。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又给了孙中山先生以强烈的刺



插图一：“四大寇”。自左至右：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

激。从此以后，孙中山先生才认识到清政府腐朽反动已经不可救药，企图由清朝统治者自己实行改革只不过是幻想，如果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剩下的只有革命一途。这时他的行动才真正达到了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阶段。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亲自起草了《兴中会宣言》，《宣言》对列强瓜分中国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会员入会誓词中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口号和目标，这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一个飞跃。兴中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着手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起事前夕运送枪械不慎，事机泄露而失败。

广州起事失败，清政府以一千元花红银的重赏缉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遂亡命海外。先后到日本、菲律宾、美国、英国，从华侨中寻找革命力量，“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⑦。由于孙中山先生一路上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引起清政府的惶恐，到处设法秘密逮捕。1896年10月11日上午，当孙中山先生在英国伦敦去拜访原香港西医学院的英籍老师康德黎时，被清驻英公使馆诱捕，准备密解回国杀害。孙中山先生被秘密拘押期间，采取种种办法与外界联系，都没有获得成功。最后他以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向清驻英公使馆英籍工人宣传，博得了使馆英籍工人柯尔的同情，柯尔夫妇冒险为孙中山先生送信给康德黎，康德黎接信后立即设法营救。由于康德黎的全力救援，以及英国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清驻英公使馆被迫不得不于10月23日释放了孙中山先生，这就是有名的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从此孙逸仙的名字传遍西方世界。

脱险以后，孙中山先生仍继续居住在伦敦。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读书，探求救国真理，还到德、法、比等国进行实际考察。在对西欧各国社会的考察中，他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其原因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⑧。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他因此提出了民生主义，他说：“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⑨。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

1897年秋，为了便于就近联络国内革命力量和策划领导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离开英国经加拿大到达日本。这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更加尖锐深重了，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武装进攻，占领我国首都北京，并且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使每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震惊和痛心，“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⑩。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已经到

来。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的，这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余人，血战逾半月，最后仍然失败了。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又一次去日本、欧洲，在崎岖曲折的革命道路上继续探索救中国的真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一个有着共同革命目标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已成为进一步推进革命的关键。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全力以赴地着手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他广泛宣传成立全国性统一革命组织的重要性，发起组织中国同盟会。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并确定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接着孙中山先生又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把这一政治纲领加以阐发，并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提出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理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挑战，在人们的头脑中树立起一种新的观念，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当时革命队伍中无可争议的共同目标，为后来辛亥革命一举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扫清了道路。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继续深入开展同改良派的尖锐斗争。这场论战持续数年之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坚持维护清政府，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通过论战戳穿了改良派维护帝制的反动主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重新集合在革命的旗帜下，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毛泽东同志曾经热烈地赞扬孙中山先生与改良派的斗争说：“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⑩。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各省连续组织了一连串的武装起义：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08年3月钦州马笃山起义，4月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到失败，但起义一次又一次地从政治上精神上给了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群众，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预示着清王朝的覆没已经为时不远了。

1911年四川等省发生了反对清政府将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清政府惊慌失措，急忙抽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革命党人乘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经过一夜的激战，起义士兵占领了武昌，两三天内又先后占领了汉阳、汉口。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当时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的十四个省区宣布独立。12月29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

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3月11日，孙中山先生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复辟帝制的幻想，都遭到人民大众的唾弃而不能得逞。对于孙中山先生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列宁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扬他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⑫。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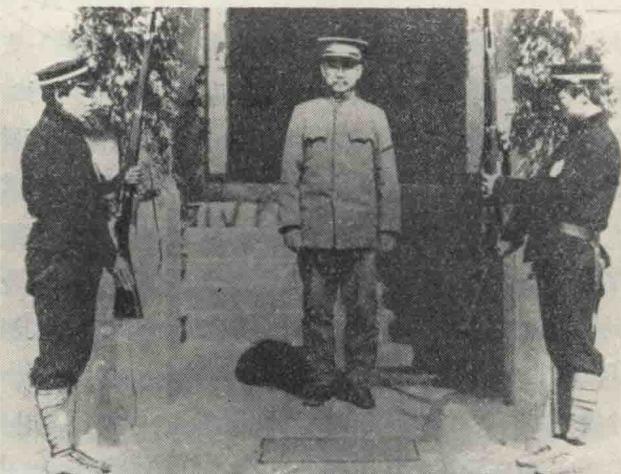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受到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和破坏，斗争的结局是“南北和议”，革命党人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和野心家袁世凯妥协，孙中山先生被迫于4月1日辞职，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攫取，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夭折了。毛泽东同志指出：“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⑬。

辛亥革命的失败，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也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以后十年，孙中山先生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失望、苦闷和探索的历程。他一次又一次地总结失败的教训，力图把革命从失败中挽救出来。首先是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作斗争，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可是不久又遭失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被弄得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而再度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先生曾经认为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党员不听他的话，精神涣散，各行其是所造成，于是在1914



插图二 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插图三 1912年在临时大总统办公楼前





插图四 1917年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他手订了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在誓约上捺指印，绝对服从总理等，但这样做也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重建的中华革命党，由于缺乏广泛的基础，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狭隘小团体。在后来的斗争中，只是进行了一些军事冒险活动，并没有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

1916年袁世凯毙命，继起的是军阀纷争混战的局面，孙中山先生再一次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会被解散，约法被践踏。因此，他认为只有恢复共和，再开国会，贯彻约法，南北才能融和，国家方可长治。于是1917年7月，他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及起义海军舰队，南下广州，联合西南桂、滇军阀，建立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宣布重开国会，号召“护法”。孙中山先生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其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被北洋军阀政府任意蹂躏，“国会”也早已声名狼藉，“护法”已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可能起到动员人民的作用。而参加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桂系军阀，又采取种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先生，他们把持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变元帅制为七总裁制。孙中山先生看穿了改组并不是为了护法，可是自己又无力反击。1918年5月，他愤然放弃总裁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先生从挫折和失败中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依靠军阀是不能恢复共和的。但是他并没有灰心，1919年10月，孙中山先生把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准备以改组的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决定夺取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1920年8月，孙中山先生命令驻福建的陈炯明率部返粤讨伐桂系军阀，冬天打下广州，孙中山先生又回到广州。1921年4月，建立了“非常政府”，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再次举起“护法”的旗帜，这一年7月平定广西，统一了两广。为了彻底扫灭军阀势力，1922年，孙中山先生决定进行北伐，在桂林组织了大本营，并亲自督师。但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受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策动，暗中牵制孙中山先生。6月16日，当孙中山先生由韶关回到广州时，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妄图暗害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事发前两小时接到报告，立即化装成中医潜出总统府，登上永丰舰，第二次“护法”斗争又告失败。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挫折，对孙中山先生教育颇深，他在《致国民党员书》中感慨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

两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先生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甚至绝望。但也使他认识到，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办法不行了，必须寻找新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⑩。历史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旧三民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正当孙中山先生在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接近了他。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热情欢迎这个新兴的革命力量。1923年，当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同他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先生立即看到了它的重要意义，热情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愿意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共同奋斗，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在共产党的帮助和参加下改组他的党。会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通过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孙中山先生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⑪。新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纲领。



插图五 在广州非常大总统办公室



插图六 1924年在天津

改组国民党和实现国共合作，遭到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攻击和反对，说孙中山先生被“赤化”了。孙中山先生严厉斥责了顽固派的攻击，据何香凝女士回忆，孙中山先生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的决断是正确的。国共合作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黄埔军官学校建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也都相继成立，遭到破坏的工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大众团结的中心，广东成为北伐的策源地，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推向全国。

1924年4月12日，孙中山先生公布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全文二十五条，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建设国家。但此时，盘据在北京的北洋军阀肆虐北方，孙中山先生决意讨伐曹（锟）吴（佩孚），扫荡军阀势力，9月5日决定北伐，组织北伐军。18日发表《北伐宣言》，声明“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倾向革命的冯玉祥举行武装政变，主张召开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问题，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大政。孙中山先生考虑到全国的和平统一，遂接受邀请，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离粤，途经上海，绕道日本北上。行前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推倒帝国主义，并具体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插图七 1924年北上天津在轮船上与宋庆龄合影

的主张。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因积劳成疾，还没有来得及与执政的军阀段祺瑞举行会议，就卧病不起。其时，段祺瑞正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以继续维护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临时执政府的承认，孙中山先生在病中拍案怒斥段祺瑞的卖国媚外行径。12月31日，孙中山先生扶病入京，决心“坐在北京反对段祺瑞”，但因肝病急剧恶化，终于不幸去世。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孙中山先生临终时遗下三份遗嘱，其中一份是给他手创的国民党的，是孙中山先生毕生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人民继续完成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谆谆嘱托。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於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先生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历经忧患，备尝艰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同志热烈称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孙中山先生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式共和国的美好愿望，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实现，并将进一步繁荣壮大，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孙中山先生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万世流芳。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

在中山陵的附近，还安息着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同志和战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的廖仲恺、何香凝和邓演达先生。

廖仲恺、何香凝墓座落在紫金山的南麓西侧。廖仲恺先生（1877—1925年），广东惠阳人，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1905年参加同盟会，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成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亲密助手。1922年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曾代表孙中山先生与列宁

的代表越飞进行会谈，为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打开了局面。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坚决执行三大政策。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1937年，国民党把廖仲恺先生的灵柩，由广州黄花岗迁葬南京。

何香凝先生（1878—1972年），广东南海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随同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和廖仲恺先生一样，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实助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疯狂屠杀和镇压，从此她坚决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正义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她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坚决反对蒋介石策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与李济深等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72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根据何香凝先生生前的意愿，合葬于廖仲恺先生墓。

邓演达墓座落在紫金山东侧的革命阵亡将士公墓。邓演达先生（1895—1931年），广东惠阳人。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辛亥革命爆发时，以陆军小学生参加了革命军。1914年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于1916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被派往西北边防军见习。1920年初参加粤军，从此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国共合作后，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黄埔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之一。1926年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主张东征讨蒋，遭蒋介石通缉。他被迫离开祖国到莫斯科。1930年春回国，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寻找第三条道路。邓演达先生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忌恨，必欲置之死地。1931年8月19日，当邓演达先生出席行动委员会干部在上海举行的受训结业典礼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7年由国务院决定，迁葬革命阵亡将士公墓。

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三位革命志士，真诚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将他们的墓园图片附于本书之后，让子孙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注释

① 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前往明孝陵一带打猎，在今中山陵所在地休息时，觉得其地迎山带水，气象雄伟，尤其地势高于明孝陵，于是笑顾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杯土，以安置躯壳尔。”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弥留之际，犹以归葬紫金